

# 国史研究范围的延伸扩大与中国“东方学”的形成〔\*〕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在日本“东洋学”及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的成果刺激下,20世纪初中国的国学及国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发生了转型,封闭的国史研究走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四裔研究,即中国与周边各民族交流史的实证研究,亦即东方区域研究;在研究模式上,形成了中华与四裔的“华化-胡化”的模式,然后又由物质性的有形的“交通史”模式,发展为更广泛的“关系史”模式,到20世纪末更聚焦于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为主导的“丝绸之路研究”这一国际性学科领域,循着这样的路径,中国的国史研究逐渐扩展为区域性的东方研究,传统国学自然延伸为中国的东方学。

〔关键词〕东方学;国史;华化-胡化;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研究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1.014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学界对外开放姿态的形成,在西方与日本学界的影响下,传统国学的封闭与保守状态逐渐被打破。中国学界认识到,当本国问题成为他国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且他国学者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又胜出一筹的时候,本国学者的学术文化的表述权也将受到削弱和遮蔽,而在当时恰恰发生了这种情况。照理说,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问题,中国学者是最有立场、最有优势、最有话语权的。但是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日本与欧洲的学者却走在了我们前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国史研究眼光受限,缺乏区域历史整体化的观念,更缺乏世界史的眼光,

因而也就难有现代意义上的整体史观与理论体系的构建。一旦意识到这一问题,中国学界便勇敢调整姿态,奋起追赶,取长补短,努力使封闭的国学成为开放的国学,使封闭的国史研究成为开放的国史研究,于是传统的国学自然延伸到了周边国家与地区,国学研究自然发展延伸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的研究模式——东方学。中国的东方学意识开始自觉,东方学由此发轫。

## 一、作为国史之延伸的四裔研究与东方学 学科意识的自觉

1928年,傅斯年在谈到中国人的学问与欧

作者简介: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东方学与东方文学,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日本文学与中日关系等。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批准号:14ZDB083)的阶段性成果。

洲汉学研究之差别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十分中肯:

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难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虜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虜学家吗?然而或许汉学之发达正借重虜学呢!<sup>[1]</sup>

在这里,傅斯年区别了“汉学”这个概念,汉学就是中国学,同时也指出在这门学问上中国人与西洋人的长处与短处。读中国的经籍,西洋人显然隔膜,于是西洋人懂得扬长避短,专注擅长于中国之四裔的研究。后来,傅斯年在另外的场合又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中国学在中国和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sup>[2]</sup>在这里,傅斯年使用了“纯粹的汉学”的说法,指的显然就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国学,而关于四裔的学问,则是传统汉学之外的一种延伸,而为外国的东方学家所重视。在傅斯年看来,研究“四裔”,就不属于“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于是四裔之学与“汉学”相对,属于他所谓的“虜学”。“虜学”这个词,他是半开玩笑地使用的,实际上抓住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的特点,也清楚地说明了“汉学”与作为汉学(国学)之延伸的中国周边民族国家之研究,是有联系更有区别的。换言之,中国的国学,理应包含这些“虜学”在内,所以他提倡今后要多研究“中央亚细亚各

地”,也要研究“南洋学”,这样一来,国学就自然扩展到“东方学”。他指出:“西洋的东方学之拿手好戏,日本今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有拱手相谢而已。”<sup>[3]</sup>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在文末大声呼吁:“我们要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sup>[4]</sup>

那么,中国人自己的学问,研究了两千年,得天独厚,究竟哪里赶不上西方人与日本人呢?西方的东方学是在什么地方刺痛了中国学人的神经呢?

现在看来,首先是历史著述方式的滞后。源于现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著述方式,以时代划分、世界视野、区域观念、系统构建、比较研究等为主要特色,以著述者独特的史学思想的表达为其灵魂。这与传统的中国国史以本国为中心、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叙述方式颇有不同。在亚洲,日本“东洋史”学者最早使用这种方法,写出了一批中国史及东洋史的著作,其中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早在1899年即被译为中文,此后几年间,下村三四吉的《东洋小史》、幸田成友的《东洋历史》、家永丰吉的《东洋文明史》等著述也陆续被译为中文。中国国内当时没有此类区域性著作,故而很受学界与读者欢迎,还被用作许多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在20世纪头三十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感于这种情况,陈寅恪1929年赠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一首诗有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sup>[5]</sup>他所指的“国史”似乎就是日本人所写的东洋史。此前,梁启超也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与刺激,痛感中国历史学需要来一场革命,提倡“新史学”,写出了《新史学》(1902)、《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等,详细论述了史学研究模式的更新与现代化问题。

实际上,就中国史籍中关于四裔的历史记载而言,远比西方丰富。中国最早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的记载,从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对当时印度及西域各国的如实观察与描述,可以说是当时关于这一区域的唯一可靠、无可替代的

信史材料。此后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明代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等等,对从印度到南洋诸国都有可靠的考察与记载,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像《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虽也含有一些深刻的社会观察与史学思想,但是用现代历史学的严格标准来看,这些古代的著作还只是历史研究的史料而已,而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当西洋人、日本人利用这些史料,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史料进行研究时,往往可以做出领先的成果,从而把史料变成了史学。而近代中国史家往往习惯于传统的治史方式,例如在元史领域,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以中国的朝代研究即断代史的方法,写成“元史”,而日本人与西方人则不限于元朝这个朝代,他们利用中国的元史材料,加上西方人的材料,而写成更大范围的“蒙古史”,这便由“中国史”走向了“东洋史”或“东方史”。

外国人的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对近代中国学者刺激较大。特别是对日本的东洋学,一开始许多中国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垣等,都表示钦敬,其中的不少著述被译成中文。但接下来,更多的是一种不服气。梁启超起初称赏日本的东洋学,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则直斥日本的那些关于东洋史的著作不值一读。这种评价的前后变化,也反映了梁启超对日本东洋学不服气的心理。当代学者翁独健回忆1928年在燕京大学听陈垣讲课时的情景时写道:“课上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sup>[6]</sup>陈垣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柴德赓也回忆说:陈垣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书桌上。’因此,他更努力钻研。”<sup>[7]</sup>于是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绩,陈垣把自己刚杀青尚未出版的书稿《元西域人华化考》,寄了一份给

当时日本东洋学的代表人物桑原鹭藏表示请教,但陈垣的心理与目的是不言而喻的,至少也在日本的第一流的东洋学家面前,显示了中国学者及东方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自信。

## 二、“华化”与“胡化”的研究模式与东方学

从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是中国学者交出的关于东方学研究最早的、最出色的答卷。该书写于1923年,这个时期也正是日本东洋学家白鸟库吉、桑原鹭藏、内藤湖南等人学术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从传统史学的角度看,该书在选题上属于元史研究的范畴,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元史研究之处在于,全书只以元朝为时空坐标,研究的却是来自西域(主要是中亚、西亚)的人如何入华、如何生活,又如何“华化”的问题。在陈垣看来,当时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文明水平相对较低,他们的“华化”不足为奇,但是西域人就不同了,他发现:“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人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sup>[8]</sup>这样看来,他所研究的中亚、西亚人,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看是“西域人”;而站在世界的东西方二分的角度看,西域人就是东方人,因此《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研究题材与对象就与传统的汉学、国学不同了,它属于中国之四裔的研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方学”的研究。

对于西域人归化于中国文化这种独特的时代现象,《元西域人华化考》创制了“华化”这个新颖而又易懂的概念来概括,并作为贯穿全书的关键词。对此作者专用“华化意义”一节做了严密界定,他强调:“华化之意义,则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故忠义、孝友、政治、事功之属,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即美术、文学,为后天所获矣,而其文学为本国之文学,或其美术非中国之美术,亦可谓西

域人之文学,西域人之美术。不得谓之西域人之中国文学,西域人之中国美术。”<sup>[9]</sup>他又指出,“华化”也不同于“归化”,归化只是入了中国籍而已,不见得有文化上的“华化”。进而又把“华化”与“华学”相区分,认为像汉魏六朝的那些佛经翻译家,熟悉华语及中国经典,那属于“华学”的范畴,也未必是“华化”。此外,据说该初稿曾使用过“中国化”“汉化”等词,而定稿时确定使用“华化”一词,表明不刻意强调国界与民族,而更着眼于文化,强调中华文化的感化作用。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为中国的东方学著作,不仅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颇有创新。同时期或稍早的日本与欧美的同类著作,大多着眼于亚洲大陆各民族的政治、军事、经贸等关系,突出“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主题,极少人系统地关注西域人的“华化”问题。如上所说,“华化”的实质是“中华文化化”,那么中华文化指的又是什么呢?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陈垣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礼俗三大方面入手,分章研究了元代那些原本信奉基督教、回回教、佛教、摩尼教的西域人,来华生活后如何接受中国儒学的熏陶,又如何接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原本那些用自己民族语言写作的西域人,如何创作汉诗,如何成为中国书法家、中国画家,如何建造与居住中国式的房屋建筑,等等。作者在每一章的研究论述中都以具体的个人为例,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所记述的在各方面“华化”的西域人共计132人。

现在看来,研究元代西域人“华化”这个问题,实为中国学者的优势,非中国学者难以为之,因为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几乎全隐含在汉文材料中。元代西域人用汉文写作的诗文,均需在汉籍中寻找。为此,陈垣遍翻经史子集,编出了《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胪列了三十多位作者的约五十种著述,书后所附征引书目,从正史、野史、地方志,到诸家文集,共二百余种。这种史料上的优势,不仅西方学者不具备,日本学者也很难具备。日本的桑原鹭藏、白鸟库吉等东洋学家的

优势在于能够利用英法德等欧美的材料,来与中文材料相互参照比较,但若是处理《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样的题目,材料几乎全在汉语文献里,只有中国学者才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想来,完全依靠和使用中文材料,研究的对象却不是传统的国史、国学问题,而是西域问题,而西域问题也不单单是西域本身的问题,而是西域人的“华化”问题,陈垣的这一富有想象力与创造性的选题,表明传统的国学范畴的历史研究走向区域性的东方研究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创新与突破!

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创制的“华化”一词,对后来的影响也颇大,形成了一种中外关系研究的思路与模式,接下来,东方学家冯承钧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唐代华化蕃胡考》一文中,袭用的就是“华化”这个概念。虽然冯承钧在文章中没有对“华化”一词的来源做过说明,也没做明确的含义界定,但他受到了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启发与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在“华化”的使用范围上,陈垣着眼于西域人的中国文化化,冯承钧则着眼于唐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氏族之所出”<sup>[10]</sup>。所谓氏族,就是家系、民族出身,以及历史人物的“蕃胡”出身。所谓“蕃胡”,指的似乎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冯承钧从新旧《唐书》中,检出蕃胡出身的人物一百数十人,其中包括鲜卑人、匈奴人、突厥人、回纥人、高丽人等。这些人作为历史人物而进入《唐史》,是完全“华化”了。冯承钧认为:“有唐一代,上自政治、文学,下迄阉宦、奴婢,在在皆有蕃胡。则当时不惟中国文化影响外国,而外国文化亦有时影响中国。”<sup>[11]</sup>而从种族的意义上说,“华化”就是归化于中华,所以冯承钧的结论是:“凡历史种族皆为杂种”,而汉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种族,是“混合人种、历史人种、社会学方面的人种”,也就是“杂种”。<sup>[12]</sup>在这个过程中,蕃胡的“华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既有“华化”,就有“胡化”。对此,历史学家、东方学家向达先生曾有《唐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1933)一文,研究唐代长安的“胡化”

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他的长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中论述更为详实。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展开了“华化”与“胡化”的双向描述,而且重点在“胡化”。向达在序言中指出:本书“兹唯刺取唐代传入中国之西域文明与长安有关者,稍加排比,述之如次。唯为此事,亦必须对于中国与西域文明有深切研究,然后可以互相比较,得其实际。顾在此间,西域史料不易搜求……。兹篇唯能将中籍史料,就耳目所能接及者,为之抉择爬梳,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实者之捃摭”。<sup>[13]</sup>的确,正如上述陈垣所言,元代西域人的“华化”是元代的特殊文化现象。而唐代汉人的“胡化”,则是唐代最突出的现象。向达抓住了“唐代长安”这一特殊都市空间,从不同方面论述了胡化现象,例如,他指出流寓长安的西域人有成千上万,连李唐氏族都可能出于蕃姓。其中有魏晋时期入居中土者,他们华化虽久,但从族姓上看便一目了然,如来自康居者姓康,来自安息者姓安,来自曹国者姓曹,来自龟兹者姓白,来自焉耆者姓龙,来自疏勒者姓裴,等等。还有一些西域的商人、僧侣、外交人士等,这些西域人一方面被“华化”,而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汉族人的“胡化”。而最为有趣且诗文中记述较多的,就是长安的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城的胡化尤为显著,突出表现在西域人的日常用品、生活方式、服装、饮食美酒、乐器、音乐舞蹈、游艺(波罗毬)等,被时人广泛喜爱而大为流行。而另一方面,胡人也在“华化”,当时许多画家就是西域人,把西域画风与画法(凹凸画法)带进来,促进了中国的国画风格的嬗变,更不用说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此时在长安也颇为兴盛。向达通过“胡化”与“华化”的交互运动,揭示了唐代长安当时作为国际性城市、东方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表明了有唐一代以长安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东方文化圈。因此可以说,《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国学意义上的国学研究,而是作为国学之延伸的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学”的研究成

果。而且,在研究中,向达显然也了解并参照了日本东洋学家的有关著述,他在书中提到了日本东洋学家桑原鹭藏、石田幹之助等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其中,石田幹之助在向达之前,曾发表过长文《长安之春》(1930),重点以唐代关于胡人、胡姬的诗篇为基本材料,展现了长安作为东方国际性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在选题上对向达似有启发。石田幹之助又有《胡旋舞小考》一文,向达称赞其“考证綦详,余愧无新材料以相印证,兹唯略述其概而已”。<sup>[14]</sup>从这里看,《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是一部具有国际“东方学”视野的著作。

### 三、从“交通史”“关系史”模式再到丝绸之路研究

向达不仅在“华化”与“胡化”的研究上有开创之功,而且在“交通史”的研究上也有开创之功。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外交通小史》,次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其《中西交通史》。此后“交通史”的模式逐渐被研究者所使用,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白寿彝《中国交通史》(1937)等著述陆续问世。同时,在基本史料的整理方面,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全六册)也于1936年由北平辅仁大学付梓印行。《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所谓的“中西”指的是中国与其西部各地区各国,包括欧洲、非洲、亚美尼亚、土耳其斯坦、印度,而未包括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资料,尽管不只限于东方学研究的范畴,但还是为此类研究奠定了资料学的基础。从现代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看,“交通史”中,有区域交通史和综合性全方位的中外交通史两种类型。在区域交通史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通史研究,属于东方学研究的范畴。这也是在“华化-胡化”研究模式之外,从国别史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以亚洲地区为基本范围的区域史的第二种研究模式。

关于“交通史”这一模式与“东方学”的关系,历史学家方豪曾指出:

欧美所谓东方学(Orientalology)及汉学(Sinology,又译华学或中国学,日人称支那

学),其重要题材之一,即为东西或中西之交通史。

东方学与汉学之兴起,盖由于元代之东来西人游记之逐渐引人注目,新航路与新地之连续发现,故最初之东方研究,实具有极浓厚之殖民地研究之意味;研究之目的既在协助之殖民政策,研究之态度与立论之观点,遂亦带殖民之色彩;且以为殖民地人士无研究自身史、地、语言、民族、宗教各方面之能力,于是东方之研究乃为西人视为非伊等莫属之事。东方学范围甚广,则有埃及学、叙利亚学、巴比伦学、印度学、日本学、蒙古学,汉学等。<sup>[15]</sup>

这就是说,西方学者的东方学及东西方交通史的研究,总体上服务于地理新发现,特别是服务于殖民的目的,成为“东方学”这门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从世界各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上看,在这个领域里西方的东方学家们走在了前面,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模式,日本人紧随其后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学者则受欧美与日本之影响,随后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模式与优势。

作为一种研究模式,中国的交通史研究固然受到西方的东方学影响,但是,历史上由中国人主动走出去的“中外交通”实际上是中国与东方国家之间的交通,而中国人与欧美地区的交往多是不直接的,而是辗转的、间接的。正如现代东方学家、东方学经典翻译家耿昇先生所指出的:“自丝路开通以来,在中国至罗马的古代交通中,中西绝少有直接来往。”<sup>[16]</sup>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中西(中国与西域地区)交通与通商,固然是以中国为起点、欧洲罗马为终点,但实际上却不是中国与西方人的直接贸易,而是中国与西域各民族,与波斯-阿拉伯等中亚、西亚各民族的直接的贸易交流。因此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在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前,除了元代马可·波罗来华这个极其个例的事件之外,中西之间的直接交通极为罕见,相互之间主要是传闻、推测与想象。因此,所谓中外交通史,实则是中国与东方国家的交通,因而属于

中国的东方学研究的范畴。

“交通史”之“交通”二字起源如何,在中国谁最早使用,待考。但“交通”是中国固有名词,应是起源于中国。然而现在人们所知最早使用“交通史”来做著述研究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他在1927年出版了《日中交通史》,该书1931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对中国学界的交通史模式研究有一定影响。木宫泰彦的《日中交通史》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交通史”,所研究的是中日两国人员与物资的交流。类似的研究,日本人也称之为“交涉史”,并有“东西交涉史”这一研究模式。例如日本东洋学家藤田丰八著有《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1936年出版中译本,译文题名为《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将“交涉”改为“交通”。中国的东方学家们的交通史研究,大多包含在一般东方史研究之中,多是先从中国与东方的某一区域开始,包括中国与南洋地区、西域地区的交通等,也多从个案研究起步,由单篇论文而至于专门著作,最后发展到综合性、总括性的交通史研究。

中国第一部交通史研究专著,是1937年出版的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中国与东方国家交通史的研究著作。关于“南洋”的范围,作者是这样界定的:“今之谓南洋,包括明代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于《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流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刺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两地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则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兹编研究之范围,东起吕宋,西达印度洋西岸。”<sup>[17]</sup>这样的“南洋”界定,基本上与现在相同,即指东南亚各国。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南洋交通史》属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古代交通史,是中国国史研究的一种延伸,属于东方学的研究范畴。《中国南洋交通史》主要研究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人员交通往来问题,所涉及的是从汉代开始直到明代,中国的僧人、使节、商人、官员等各类人物,如何经过南洋,如何观察

南洋,如何描述南洋的地理、风土、人情、物产等问题。冯承钧充分利用中国历代正史以及历史人物的各种游记,同时参照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等欧洲学者的著作,主要采用国名、地名考证,交通个例的时间节点的梳理辨析等史料校勘与考证的方法,将汉代以降一千余年间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通轨迹动态地描述出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一研究可以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很早之前就具有持续不断的深刻交往与联系,南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区域性共同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开了课题研究之先河,随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其中,属于中国与东方各国的交通史研究的,有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956)、安作章的《汉代与西域交通史》(1959)、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1965)等。而其中集大成的作品是方豪的长达80万字的《中西交通史》(1953—1954),其特点是把此前的中国与东方各国的交通史研究,扩大到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史研究,亦即由东方史的范畴扩大到世界史的范畴。交通史的这种研究模式延续发展到1980年代,不断有新成果出现,但同时也开始向更广阔的“中外关系史”模式演变,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转变。1985年,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朱杰勤先生曾撰文对“中外交通史”与“中外关系史”乃至日本学者使用的“交涉史”等概念作了辨析,他认为:

中国海外交通史作为一种有系统的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大概开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顾名思义,海外交通史是研究中国与海外各国海陆交通的建立与发展,而限于研究中国和海外各国的海上交通……中国海外交通史就是中外关系史的同义语……中外交通史一词容易使人认为只属于海陆交通方面,而中外交涉史一词又使人容易认为仅属于外交方面,都不妥当,不如中外关系史一词的通俗易懂,而且比较明确和全面。<sup>[18]</sup>

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交通史,又不限于交通史,一切关系,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都可以纳入关系史的范畴。因而很难说“中国海外交通史就是中外关系史的同义语”,因为“关系史”要比“交通史”的范畴广大得多。这样看来,“中外交通史”与“中外关系史”就不仅是学术研究模式称谓的不同,也意味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扩大与深化。一般而论,“关系史”主要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交通、交流关系,也可以是研究者为了说明某一理论问题而进行的没有事实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但是在崇尚史料与实证研究的一般史学界,这种平行比较的关系研究较少,而更多见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大体上,关系史模式在1980年代后逐渐确立,还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团体——“中外关系史学会”。学会编辑推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1984)、《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1985)等系列出版物,推动了此前的交通史模式向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拓展,相关的成果也陆续出现。从中国的东方史学术史角度看,大部分的成果属于以中国为中心,作为国史研究之延伸拓展的中国与亚洲各国关系史的研究。其中最多的成果还是出自中国与南洋(东南亚)各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及西域中亚各国之关系研究的领域。因为中国与周边这些东方各国关系源远流长,这方面的史籍、史料最为丰富。而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研究,则更多依赖于来华的西方人的游记见闻,依赖于《马可波罗游记》《鲁布鲁克东行纪》《格朗嘉宾蒙古行纪》等来自西方人的材料。因而可以说,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中国东方学研究的发达。

中外交通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都与丝绸之路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前者包含后者,后者是从前者分蘖的一种模式。而且在1980年代后,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一般都涉及丝绸之路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就是较早由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关系的研究而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他在1981年就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加以界说。蒙元史专家、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是由蒙元史研究而自然地介入丝绸之路研究的,其大作《丝绸之路》(2014)以50多万字的篇幅,既综合吸收了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独特的史料、考察与学术观点含在其中,将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知识融为一炉,可谓丝绸之路研究的集大成。刘迎胜的论文集《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2017),主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亚、西域及敦煌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中亚研究、西域研究、敦煌学、中古中国与伊朗、粟特等外来文明之关系研究,也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他的论文集《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2015)以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为经纬,将有关个案研究的论文编辑起来,体现出作者的独到研究与学术个性。

说到底,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其功能就是将“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这样一个广漠的领域,落实在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亚洲世界各国为实际到达点的“丝绸之路”上,也就使这一研究进入了中国的东方学研究的范畴之内,并且在研究的时段上也有了限定,那就是“以中国为主导、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历史时期。至于16世纪以后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外交通史、关系史,自然不在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之内。这一点虽然尚未在丝绸之路研究、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达成普遍共识,但从中国主导的立场上、从中国的东方学属性上说,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丝绸之路研究属于中国的东方学”,原因与目的也在于此。

而且,“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这些学科名称,只是中国学者使用的学科称谓,似乎并不在国际上广泛通用。但“丝绸之路研究”就不同了,它早已形成了一门国际性学科。中国的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向丝绸之路研究聚焦,方得以进入“丝绸之路研究”这一国际性的

学科领域,并有机会展现中国独特的学术资源与学科优势。历来,西方人的“东方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学,其研究的重心早先是在西亚中东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人在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察与考古,而将东方学的研究重点向东延伸至中亚地区,当发现了“丝绸”这一至关重要的媒介物之后,其范围开始进一步往东延伸,一直延伸至丝绸之乡中国,于是西方的“丝绸之路”的研究模式最终得以形成。换言之,丝绸之路研究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向东扩大的结果;而在中国,则是传统的国史研究延伸为中外交通史研究,再扩大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最后聚焦于丝绸之路研究。循着这样的路径,中国的国史研究逐渐延伸扩展为区域性的东方研究,传统国学自然延伸为中国的东方学。

注释:

- [1][3][4]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趣旨》,《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傅斯年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153、154、157页。
- [2]傅斯年:《在史语所公宴伯希和席上之欢迎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荏平》,《北平时报》1933年1月15日。
- [5]转引自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6页。
- [6]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
- [7]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柴德赓:《史学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6页。
- [8][9]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4页。
- [10][11][12]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冯承钧学术论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6、63、67页。
- [13][1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6、75页。
- [15]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页。
- [16]耿昇:《丝绸之路与法国学者的研究》,[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卷首),耿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 [17]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
- [18]朱杰勤:《对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管见》,《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收于《朱杰勤文集·中外关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9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